

国际贸易和自然资源“诅咒”：中国的增长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了吗？

Ian Coxhead*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融入全球市场，东南亚资源丰富国家正在不断丧失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同时其资源开发变得更为有利可图。对这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一些最为贫穷同时又正处于减少中央对资源控制管理的分权过程中的国家而言，这一趋势如何影响长期增长和福利？正如“自然资源诅咒”所预言一样，快速的资源采伐和减速的工业发展可能会使这些国家进入慢速经济增长时期。

关键词 资源诅咒，贸易，工业化，地方分权

一、自然资源丰裕“诅咒”

“自然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塑造的众多富有神秘色彩的短语之一。它意指由于不能持续有效地利用资源要素，尤其是那些生产力潜能最高的产业没有能够做到持续有效利用生产要素，而导致的低增长。正如 Sachs and Warner (2001: 828) 所描述的，“……事实上那些自然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群体和高 GDP 国家群体之间是没有共同点的，……密集的资源总是和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

自然资源诅咒至今从未在东南亚国家灵验过，该地区一些资源丰富经济体保持着无论是相对于全球资源丰富国家整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体都异常高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然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分工链最底端的东南亚国家而言，近来全球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其国内改革和制度上的缺陷给其今后发展提出了直接和间接的现实问题。

本文认为那些持续获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东南亚资源丰裕的经济体正面临着全球和其国内新形势的挑战。从全球角度来看，随着中国不断地活跃于世界市场（诸如加入 WTO，MFA 服装出口配额的取消，削减与日本、东亚以及东盟之间的贸易壁垒），可预期中国持续的发展和结构调整将对东南

* Ian Coxhead,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通信地址: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Dept. Ag & App. Econ, 413 Taylor Hal, 427 Lorch St, Madison, WI 537096, USA; 电话: +1-608-262-6390; 传真: +1-608-262-4376; E-mail: coxhead@wisc.edu。内部讨论稿 No. 480 (修改版)。此文受惠于第 22 届 Indonesia Update 年会 (Canberra, September 2004) 上的与会者对此文早期版本的评论。感谢 Muqun Li 和 Aksarapak Wongcharoen 在研究上给予我的帮助。

亚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结构发生显著的影响。世界银行最近评估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以及地区贸易将导致东南亚资源丰裕国家在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出口萎缩,同时他们会更多地集中于资源密集品的出口。已经有相当文献(Weiss and Gao, 2002; Ianchovichina and Walmsley, 2003; Ng and Yeats, 2003; Ianchovichina and Martin, 2004; Lall and Albaladejo, 2004)记载了各国制造业出口的发展趋势,然而相对应地在自然资源出口上的地区比较优势变化趋势及其后果至今仍未得到深入地分析。

从这些东南亚国家国内情况来看,对森林、渔场和耕地等自然资源控制的分散化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资源控制体系摇摇欲坠。尽管地方分权有很多正面作用,从已有记录来看这些运动对“国有资产”管理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本文的一个主要论点认为:如果地方分权削弱了对自然资源存量的管理和保护,那么中国贸易效应将对这些国家的福利造成负面影响。

在关注资源丰裕国家特殊的管理体制的同时,本文着重于从一般均衡角度研究部门间的联系。资源采伐速度的增加不仅是管制弱化引起的,开采活动相对于制造业生产的利润变化也是重要原因。需求驱动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在制造业和资源部门扮演着重要角色。进一步来说,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收缩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使得资源开采的利润上升,由此资源采伐速度也上升了。

本文从讨论“诅咒”以及对相关经验证据的回顾开始,接下来我们要简单地考察来自东南亚资源丰裕国家的数据。这些回顾引出了以下问题,“中国的扩展和不断融入世界市场对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随后,我们探究东南亚正经历地方分权的资源丰裕国家中一项新政策以及新制度安排与各种假定的生产贸易结构变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方式。最后文章对东南亚国家未来的增长路径、福利后果和环境影响给出了进行深入探索的意见。

二、资源诅咒:理论和经验证据

该理论认为资源丰裕引发了低增长并因此扩大了资源富裕国和资源匮乏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一发现已经得到 Sachs and Warner (1995, 2001) 在数篇著名文章中的计量结果支持。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远不止一种理论。第一,自然资源出口的荷兰病效应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被认为最具有正的生产外部性因此能够给整个行业带来规模经济。资源部门扩展和非贸易部门的二次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上的竞争,这些竞争增加要素成本从而降低了制造业的发展,慢速的制造业发展降低了经济动态增长的潜力。

第二, 有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的开发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从而减少了教育投资激励 (Gylfason, 2001)。制造业是随着发展人力资本投入集中度不断增加的部门, 因而教育投资激励的降低使得人力资本存量不足, 资源丰裕国家在努力往制造业分工链高端或者产品多样化方向发展时, 经历了陷入低水平陷阱的风险。

第三, 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资源财富促使国家从“发展型政府”向“掠夺型政府”升级。这个过程中资源财富起着两种作用, 获取资源租金引发的腐败积极地诱导着“掠夺型政府”的成长, 或是由于资源开采获得的收入降低了政策和管制的有效性从而侵蚀了“发展型政府” (Auty, 2001)。这一流派的观点在研究拉丁美洲和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案例时被广泛地运用。

第四, 有观点认为荷兰病引发了非资源贸易部门产出的收缩, 这些收缩带来动荡性的后果引发了低增长。由于资源产品等日用品价格比其他商品价格的波动大得多, 一个国家的 GDP 和贸易越是集中在资源密集部门, 资源出口引发的全球市场波动效应会被显著放大¹。

关于资源诅咒的实证经验并不像理论那样能够说服人。有些看起来似乎是由于自然资源财富引起的低增长其实可能是由某些跟资源无关的现象造成。特别地, 有一点很重要, Sachs 和 Warner 观察到的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低增长现象并不是从始至终的, 很多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相当快的, 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减速。因此把相当长时间的增长率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的结构稳定性是有问题的。此外, 80 年代的低增长并不是资源丰裕国家的特有现象, 更可能是债务问题或者石油危机后的格局不均衡以及调整不完全 (Manzano and Rigobon, 2001), 加上当时全球商品价格低迷的结果。

另外一些批评把注意力集中在导出资源诅咒的计量方法上。一种论点把事前的资源丰裕度衡量和事后的资源依赖区分开, 后者 (比如贸易要素密集度) 易受到内生性的影响, 因为事后的要素密集不仅取决于比较优势, 同时还反映了影响特定部门的政策以及诸如汇率等跟贸易有关的宏观变量的作用²。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关于资源丰裕和资源依赖的定义以及被定义为资源丰裕或是依赖的国家在资源要素丰裕 (稀缺) 上的稳定性。这个争论类似于关于开放的鉴定问题, 在一种衡量指标下一个国家可能被划分为“开放的”而在另外一套指标体系里就不是 (Rodriguez and Rodrik, 1999)。相对比

¹ Hausmann 和 Rigobon (2002) 指出, 由于资源部门专业化伴随着非贸易部门规模的增加 (通过荷兰病效应), 全球市场的动荡转变为更大的国内市场变化。消化外部冲击的负担更多地通过支出效应进行调整而不是跨部门要素移动与支出变动共同来完成, 这样增加了实际汇率的不稳定性。

² Sachs-Warner 模型数据中, 标准的 Hausmann 检验发现资源依赖变量也就是 GDP 中资源出口比例是内生的 (Li and Coxhead 2005)。

贸易和增长文献中的方法, Sachs and Warner (1995, 2001) 没有对“丰裕”和“依赖”给出严格的定义, 但是如何鉴定资源“过多”却是他们得出结论的前提³。

以上回顾能够得出的一个合理推论是: 尽管有很强的理论研究提出资源财富丰裕与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非直接也远非简单明了。更进一步, 资源丰裕和经济福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赖于至少一种扭曲——市场失灵或是制度安排失效。事实上每一个资源丰裕国家都在其制度和经济特征基础上经历着独有的资源财富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只是所有这些过程导致了类似的结果⁴。

三、东南亚如何逃离了诅咒?

资源诅咒的所有理论特征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东南亚各个资源丰裕国家。然而令人困惑的是, 事实上以世界标准来看这个地区的资源丰裕国家一直处于快速增长中。图 1 显示了在 1971 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至少 60% 的国家群体的人均增长率 (1975—2001)。增长率均值和出口要素均值线将整张图划分为四个象限。从图中容易看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包括智利和斯里兰卡) 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群体, 这些最初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经历了几乎三十年的高 GDP 增长。因此如果资源诅咒对发展中国家是普遍成立的, 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体一定经历或是正在经历某种特有的发展推动力影响, 并且这种推动的作用远超过仅仅弥补资源诅咒的负面影响。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该地区大量的 FDI 流入, 流入东南亚 (不包括新加坡) 的净 FDI 资本从 1985 年的 11 亿美元飞涨到 1991 年的超过 72 亿美元 (图 2)。资本流入的海量增加启动了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 并且使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跟随比他们富裕得多的东北亚国家以及新加坡一起入围了世界银行冠以“东亚奇迹”的八个经济体。

这三个经济体不仅在 1986 年后十年多时间里持续快速地增长, 同时他们经历了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些变化使其对资源的依赖性大大消减了。到 90 年代初期, 所有的东南亚市场经济国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在总价值上远超过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于是, 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经济体中资源诅咒是被这样一个机理过程阻止的: 大量 FDI 流入驱动了 80 年代中后期劳动密集型制造

³ 同样值得注意, 在增长经验研究文献中, 绝大多数回归模型都专门集中于资源诅咒假说从而把资源丰裕度作为影响长期增长率的一个显著因素 (深入研究请参考 Li and Coxhead, 2005)。

⁴ 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趋同进化概念, 举例来说, 鸟和蜜蜂都有翅膀不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祖先, 而是由于它们以相近的方式去适应环境。同样, 观察到资源财富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并不能简单地把所有的数据归为由同一作用机理生成。真实原因的检验必须包括分析各个相关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以此区分数据, 就像一些增长研究经验文献中所做的 (Durlauf and Johnson, 1995; Brock and Durlauf, 2001)。

在这十年中,伴随着出口品价格大幅下滑,高水平债务利率不断攀升以及净资本流出,导致 GDP 持续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相比之下,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资源丰富国家在 1985 年经历增长减速或是温和的不景气后就步入了历史性快速发展的十年。

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个显著的逆转和两个积极的转变。全球市场上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空前加强,流入该经济体的 FDI 不断减少(图 2)。比较积极的转变是,在一些国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计算机和零配件生产增加了,同时自然资源出口已经迅速增加。给定各国经济结构和贸易模式的差异,这些趋势对各个东南亚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么,如果这些趋势一直发展下去,是否资源诅咒就会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灵验呢?接下来的两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的潜在变化,接着考察这些转变与该国已知的市场和制度安排失效相互作用应验资源诅咒的可能方式。

四、东南亚对中国发展的反应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东亚内部⁵贸易量已经出现了巨大增长,其贸易增长率在 1985 年到 2001 年间达到 15%,远超过同期其他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应的数字为 9.1%)。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地位在地区贸易间与日俱增,从 1975 年占地区总贸易的 1% 上升到 2001 年的 7% (Ng and Yeats, 2003)。2001 年时 GDP 占地区总量 43% 的中国吸收该地区 30% 的出口 (Ng and Yeats, 2003)。中国从 1980 年起持续的大约年均 7% 的增长(在 2003 年和 2004 年超过 9%) 成为地区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贸易依赖度越来越高,很多因素造就了这一趋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加入 WTO 和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贸易自由化。

在中国总进口中,东盟所占比例在 90 年代从 6% 上升到 9%,从进口价值量来说增加了 390% (Ianchovichina and Walmsley, 2003)。相对而言,东盟经济体地区贸易中流向中国的比例飞速增长,出口到中国的总量的增长远超过其总出口量的增长(表 1,或是 Ng and Yeats 2003,表 6.1)。可预期这一贸易增长模式最起码在未来的十年会得到延续,即使不一定以同样的增长率。

⁵ 该定义包含了东盟国家。

表 1 东南亚,中国在其贸易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百分比)和排序

国家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马来西亚	出口	2.10	2.56	3.09	4.33	5.63	10.78
	排序	10	9	9	6	5	3
	进口	1.92	2.20	3.94	5.19	7.74	6.82
	排序	7	7	5	4	4	4
印度尼西亚	出口	3.25	3.83	4.46	3.91	5.08	7.43
	排序	5	5	5	5	5	4
	进口	2.97	3.68	6.03	5.95	7.76	11.72
	排序	7	8	5	5	4	2
菲律宾	出口	0.75	1.20	1.74	2.47	3.85	12.00
	排序	10	10	10	10	8	3
	进口	1.40	2.34	2.28	2.95	3.54	6.99
	排序	9	8	9	7	7	4
泰国	出口	1.16	2.87	4.07	4.40	5.16	7.09
	排序	10	6	6	5	5	4
	进口	3.31	2.84	5.45	5.98	7.61	8.00
	排序	6	7	4	3	3	3
越南	出口	0.31	6.44	10.61	9.44	6.45	6.40
	排序	6	3	2	2	4	4
	进口	0.16	3.94	8.96	9.91	11.82	14.06
	排序	8	6	4	4	2	1

资料来源:亚洲发展银行,“主要国家指标”(http://www.adb.org/Statistics/), 2004 年 8 月。

五、全球市场上的竞争

中国在制造业上的膨胀会产生复杂的影响。从 2005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 ATC (The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制定了有秩序地瓦解 MFA 的程序过程, ATC 将对全球生产贸易格局发生深远的影响。该协定取消了 MFA 在对美国和欧盟服装出口上的配额, 由此将消除全球资源配置上的一个严重扭曲, 把低成本制造商特别是中国⁶ 推到了生产和出口一线。

与此同时, 中国与其他低收入国家之间在两者之外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空前加强了。中国加入 WTO 后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准入, 同时消减了进口中间品的成本,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东南亚经济体中主要制造部门的竞争优势 (Ianchovichina and Walmsley, 2003; Ianchovichina and Martin, 2004)。更进一步, 如果 FDI 流向跟生产配置变动同方向, 那么从长期来看中国在这些部门的领跑优势显得越发明显。

⁶ 只需对比美国和欧盟市场中所占份额和没有配额限制的日本市场中中国产品市场份额, 这一点就很明显。

以上所述的发展趋势对东南亚国家有多重要?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贸易中相互竞争或是互补的程度。事前的要素禀赋测量对于预见贸易模式作用甚微 (Trefler, 1995), 因此经验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后测量。测量的一个指标是两个国家 (经济体) 在出口品上的重合度。最近的一篇文献用这个指标显示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出口之间的高重合度, 并且中国与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重合度在不断增加 (表 2)。从中国制造业发展增加了出口生产流水线同时逐渐变得更为资本密集型开始 (Kwan, 2002; Weiss and Gao, 2002), 重合度就与日俱增⁷。

表 2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
(用价值权数加总的同一产品分类中的重合百分比)

国家	1990	1995	2000
新加坡	14.8	19.2	35.8
印尼	85.3	85.5	82.8
马来西亚	37.1	38.9	48.7
菲律宾	46.3	47.8	46.1
泰国	42.2	56.3	65.4

资料来源: Kwan (2002), 表 2。

显性比较优势的测量 (Balassa, 1965) 提供了更多的多边贸易中要素密集度的详细启示。RCA 衡量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上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率。具体来说, 假定国家 j 在 t 时期出口商品 k , RCA 被定义为 $RCA_{jkt} = \frac{X_{kt}^j / X_{Kt}^j}{X_{kt}^W / X_{Kt}^W}$, 其中 K 表示从 j 国家或是世界出口的总和。一般地, RCA_{jkt} 值大于 1 时意味着 j 国家在 t 年 k 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小于 1 则对应该国在该商品上的比较劣势⁸。表 3 给出了根据几个大分类商品的最近数据计算的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 RCA (大于 1 的数值用黑体表示出来了)。中国在绝大多数农业部门 (SITC 分类 0, 1, 4 和 22) 以及除了煤炭和化肥外的自然资源部门 (SITC 分类 2, 3, 68) 显示了低 RCA 值, 同时在各种装配部门 (71—81, 特别是电器电子设备, 计算机以及其零配件和办公设备部门)、家具部门 (SITC 分类 82)、服装和鞋类以及配件生产部门有很高的 RCA 值 (SITC 分类 83—85)。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在农业和资源部门拥有的高 RCA 值的子部门最为广泛。这些经济体同时还跟中国一样在诸如家具、服装、鞋业、背包以及装饰品和电器电子产品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存在高 RCA 值, 并且这些部门出口占上述国家总出口

⁷ 生产结构上一些相似性的增加反应的是地区内部产业内贸易竞争而不是在第三市场的竞争 (Athukorala, 2003), 尽管 FDI 从东盟向中国明显的转移趋势被当作是这些潜在收益的原因。

⁸ 当然, RCA 作为测量相当比较优势指标的精确度会受到诸如贸易政策等扭曲的影响。由于数据限制, 在此我们忽略了这些影响。

很大比例。这些都反应在图 3—8 中。水平轴上所列的每一个产品分类, 根据与其对应的气泡的纵坐标刻度即为相应的 RCA 值, 气泡的大小则表示该类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图 3 显示中国几乎所有的出口收入来自于 SITC 分类 7 和 8 中各种行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图 4 和图 5) 在 1980 年仍然有超过 75% 的出口收入来自初级产品, 现在都倚重于诸如计算机元件和电器电子产品等中等技术含量产业。尽管马来西亚在棕榈油、橡胶和一些木材产品上保持相当的优势, 这些产业对其出口贡献却是很小的。泰国 (图 6) 尽管也有相当部分出口收入来自农业 (SITC 分类 0 和橡胶, #22), 制造业出口还是主要部分。与此相对比, 越南 (图 7) 和印度尼西亚 (图 8) 既是资源丰裕型, 同时又是资源出口依赖型的: 农业、渔业和自然资源产品占总出口很大比例。在制造业领域, 尽管印度尼西亚有相当的出口收入来自木制品、家具和纺织品等基于资源的半制造业, 总体来说两国都严重依赖于服装、鞋业和饰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表 3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 RCA 值(2000—2003 的平均值)

分类	分类号 ^a	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b	泰国	越南 ^c
活动物	00	0.78	0.39	0.72	0.06	0.23	0.18
肉及肉制品	01	0.58	0.06	0.04	0.01	1.77	0.29
乳制品和蛋品	02	0.06	0.27	0.23	0.19	0.27	1.85
鱼、甲壳及软体类动物及其制品	03	1.83	3.47	0.51	1.44	7.59	13.60
谷物及其支配	04	0.70	0.16	0.20	0.12	3.12	5.54
蔬菜和水果	05	1.14	0.46	0.20	1.62	1.67	2.78
糖、糖制品和蜂蜜	06	0.43	0.43	0.44	0.75	4.78	1.08
咖啡、茶、可可、调味品及其制品	07	0.46	4.28	0.84	0.09	0.26	10.41
饲料	08	0.34	0.49	0.36	0.27	1.29	0.06
杂项食品	09	0.68	0.83	0.98	0.52	1.64	1.72
饮料	11	0.27	0.04	0.23	0.08	0.26	0.10
烟草及其制品	12	0.40	1.26	0.70	0.32	0.32	0.44
皮革及生毛皮	21	0.03	0.03	0.05	0.01	0.03	0.45
油籽及含油果实	22	0.59	0.09	0.04	0.02	0.05	1.32
生胶	23	0.14	10.92	4.41	0.29	15.08	7.12
软木及木材	24	0.28	1.25	2.58	0.13	0.47	0.54
纸浆和废纸	25	0.01	3.47	0.00	0.28	0.55	0.00
纺织纤维(羊毛纱除外)	26	0.95	0.78	0.27	0.17	1.23	0.15
天然肥料和矿物	27	1.66	0.78	0.19	0.22	1.81	0.35
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	28	0.07	4.25	0.11	0.84	0.23	0.37
其他动物、植物原料	29	1.34	0.58	0.16	0.82	0.69	1.49
煤、焦炭及煤砖	32	2.84	7.26	0.00	0.00	0.00	1.93
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	33	0.24	1.98	0.96	0.15	0.42	3.42
天然气及人造气	34	0.06	8.68	3.14	0.09	0.26	0.00
电流	35	1.17	0.00	0.02	n. a.	n. a.	0.07
动、植物油、脂及蜡	41	0.09	0.08	0.02	0.02	0.07	0.07
初榨、精制或分离的固定植物油、脂	42	0.11	13.02	13.44	4.51	0.42	1.28

(续表)

分类	分类号 ^a	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b	泰国	越南 ^c
已加工的动、植物油、脂	43	0.07	3.38	15.22	0.78	0.88	0.08
有机化学品	51	0.54	0.83	0.65	0.05	0.53	0.10
无机化学品	52	1.62	0.57	0.23	0.19	0.24	0.07
燃料、鞣料及着色料	53	0.73	0.34	0.38	0.08	0.29	0.07
医药品	54	0.30	0.07	0.04	0.03	0.08	0.02
精油、香膏及芳香料	55	0.25	0.72	0.36	0.15	0.71	0.45
肥料(272组货品除外)	56	0.56	1.10	0.62	0.52	0.12	0.13
初级形状的塑料	57	0.17	0.62	0.70	0.07	1.78	0.04
非初级形状的塑料	58	0.27	0.57	0.49	0.20	0.58	0.17
未列名化学原料及产品	59	0.53	0.30	0.57	0.13	0.61	0.26
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	61	1.34	0.44	0.11	0.04	1.73	0.33
橡胶制品	62	0.74	0.96	0.52	0.27	1.54	0.31
软木及木制品(家具除外)	63	1.22	8.83	3.11	0.81	1.08	1.21
纸和纸板	64	0.31	2.10	0.22	0.15	0.53	0.25
纺织纱线、织物未列名制品及相关产品	65	2.51	2.11	0.45	0.31	1.12	0.92
未列名非金属制品	66	0.91	0.63	0.36	0.26	1.19	0.60
钢铁	67	0.55	0.34	0.37	0.02	0.52	0.13
有色金属	68	0.71	0.98	0.47	0.52	0.29	0.09
未列名金属制品	69	1.67	0.41	0.44	0.19	0.76	0.26
动力机械及设备	71	0.40	0.28	0.29	0.08	0.64	0.15
特种工业专用机械	72	0.31	0.10	0.27	0.18	0.18	0.19
金工机械	73	0.37	0.04	0.23	0.13	0.25	0.06
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	74	0.71	0.19	0.36	0.15	0.88	0.06
办公室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75	2.00	0.72	3.52	3.72	2.19	0.55
电信及声音的录制或重放装置及设备	76	1.98	1.19	2.57	0.70	1.23	0.14
未列名电力装置和装备	77	1.05	0.46	2.76	5.12	1.60	0.32
陆路车辆	78	0.26	0.10	0.05	0.22	0.45	0.09
其他运输设备	79	0.30	0.07	0.12	0.13	0.19	0.04
活动房屋;卫生、水道、供热和照明装置	81	2.45	0.37	0.22	0.36	0.64	0.18
家具及填充制品	82	1.88	2.44	1.51	0.93	1.28	1.69
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	83	5.12	0.87	0.06	2.48	2.00	4.33
服装及衣着制品	84	4.12	2.28	0.68	2.15	1.61	3.88
鞋靴	85	4.59	3.02	0.13	0.24	1.51	13.42
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设备	87	0.55	0.06	0.62	0.20	0.25	0.07
摄影器材及钟表	88	1.25	0.29	0.79	0.99	1.05	0.21
未列名杂项制品	89	2.10	0.55	0.58	0.42	1.06	0.54
特殊交易及商品	93	0.09	0.01	0.42	0.01	1.09	0.83
铸币(金币除外)	96	0.78	0.01	0.07	0.12	0.27	0.01
非货币用途的黄金	97	0.00	1.67	0.36	0.80	0.51	0.06

注:^a SITC 3 产品分类标准;^b仅 2000—2002;^c仅 2000—2001。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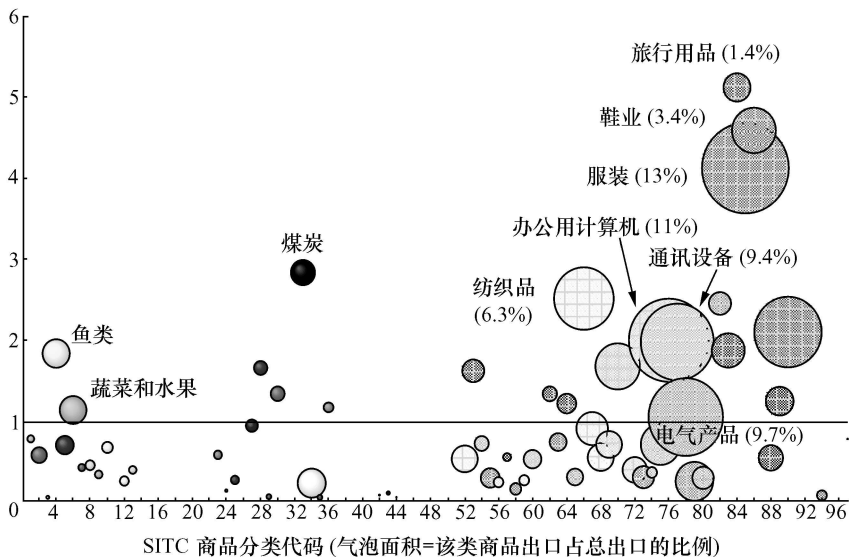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RCA 和商品出口组成，2000—2003
(2003 年出口占 GDP 比重=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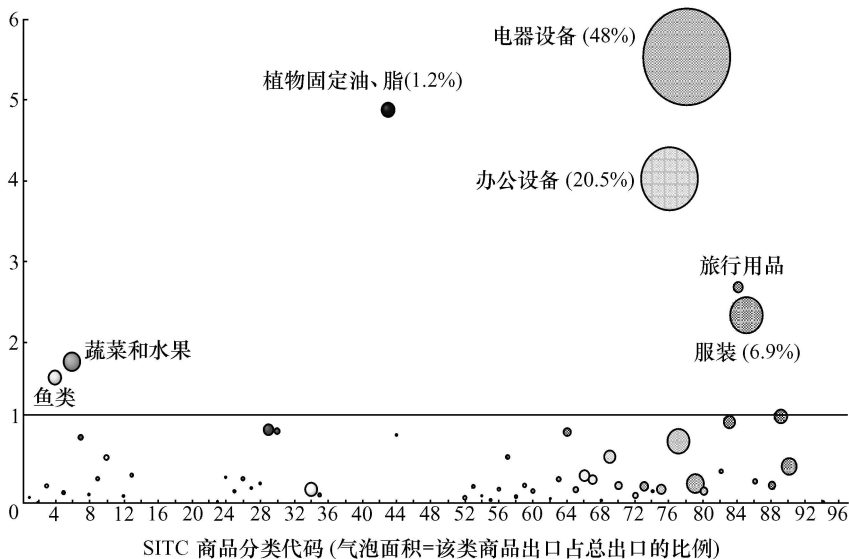


图 4 菲律宾：RCA 和商品出口组成，2000—2003
(2003 年出口占 GDP 比重=4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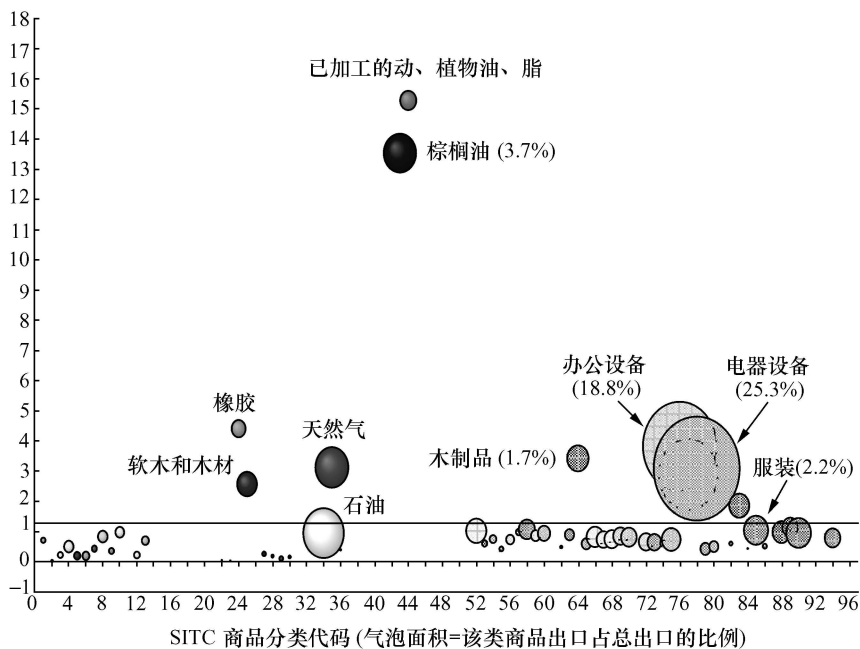


图 5 马来西亚: RCA 和商品出口组成, 2000—2003
(2003 年出口占 GDP 比重=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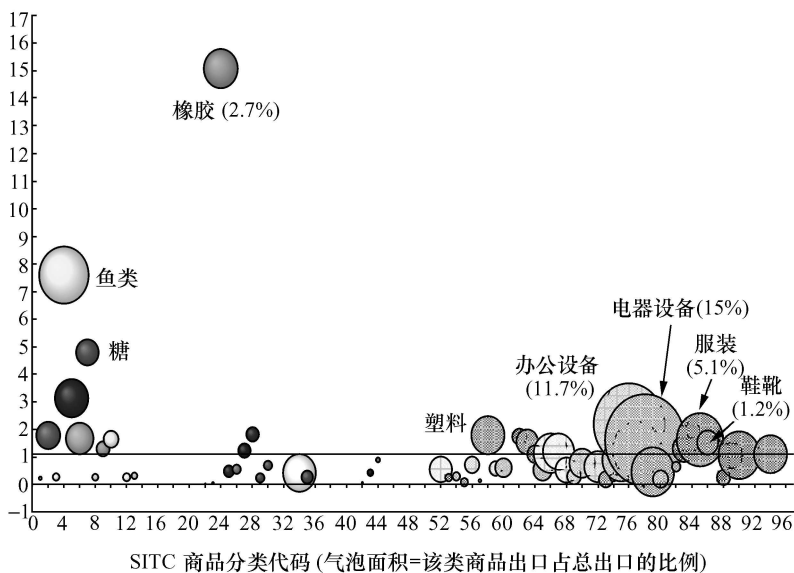


图 6 泰国: RCA 和商品出口组成, 2000—2003
(2003 年出口占 GDP 比重=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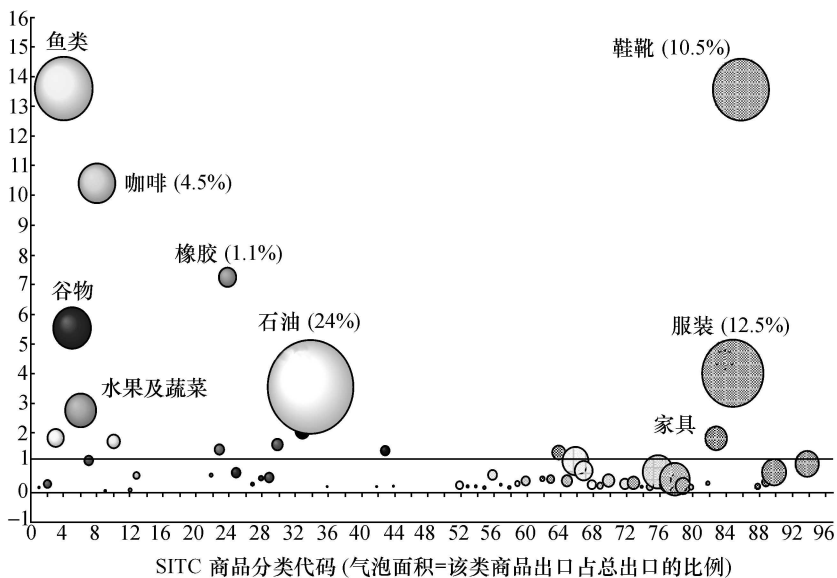


图 7 越南, RCA 和商品出口组成, 2000—2001
(2001 年出口占 GDP 比重 =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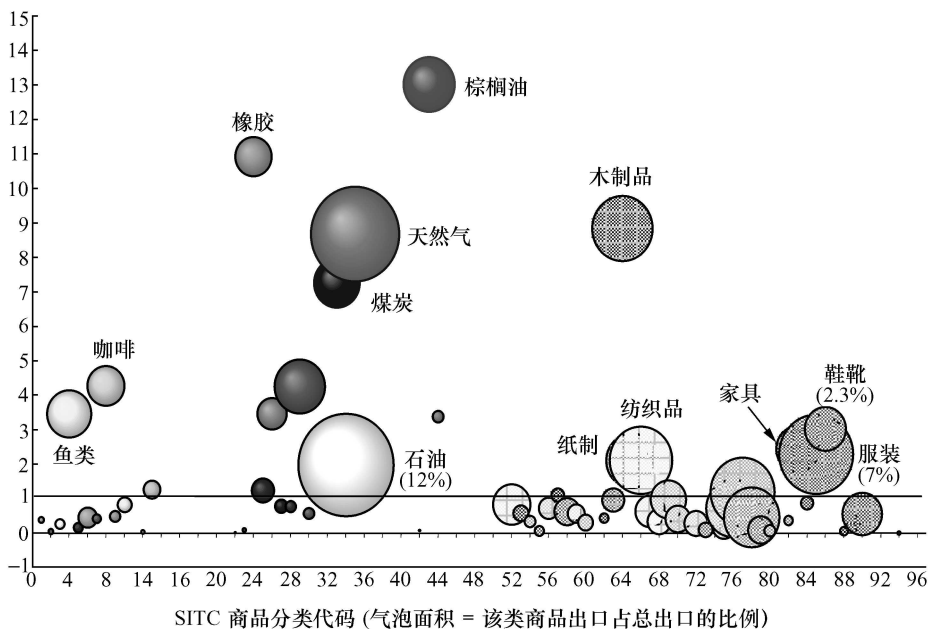


图 8 印度尼西亚, RCA 和商品出口组成, 2000—2003
(2001 年出口占 GDP 比重 = 30.4%)

六、双边比较优势变化趋势

RCA 测度比较了一国某商品占全部出口的份额与全球出口中该商品所占份额。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快速上升的双边贸易比例(表 1)和东南亚国家对世界出口与其对世界其他市场出口(图 9)显著不同的方式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凸现为领导型贸易伙伴将对东南亚地区出口模式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图 9 显示了主要分类产品目前的贸易数据,证实了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出口品的资源要素密集度要高于他们对世界总体出口的资源密集度。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中国和各个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来预测今后贸易趋势的发展,具体做法是把各东南亚国家的 RCA 值(向量)减去中国的 RCA 值。图 10—14 显示了根据 2000—2003 年平均贸易数据计算获得的结果,每个产品分类气泡的大小代表一国横轴对应的商品出口占该国对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基于目前的贸易模式,这些数据暗示了如果只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些东南亚国家可能的出口组成,并且提供了指标来反应当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地位上升时这些国家出口可能发生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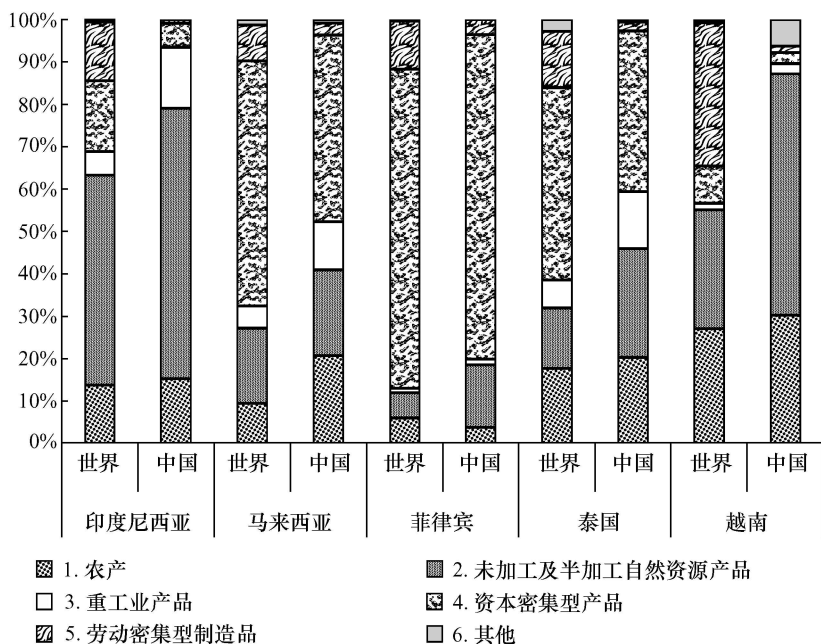


图 9 东南亚国家对世界和中国出口的部门组成对比

双边数据清晰地显示了三个不同工业组的发展变化模式。首先,在诸如电子业等中等技术和高技术行业拥有很强比较优势的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将会增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图 10 和图 11),泰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遵照这种模式(图 12)。可预期这种双边贸易可以得益于东亚内部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降低,以及组件(主要是零部件)生产国际化的发展(Arndt and 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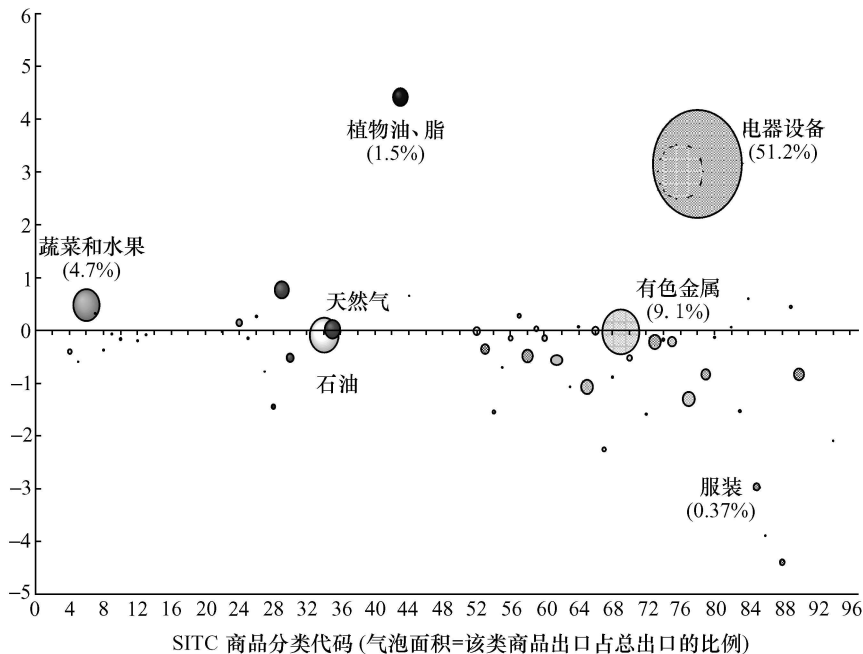


图 10 菲律宾—中国 RCA 构成, 2000—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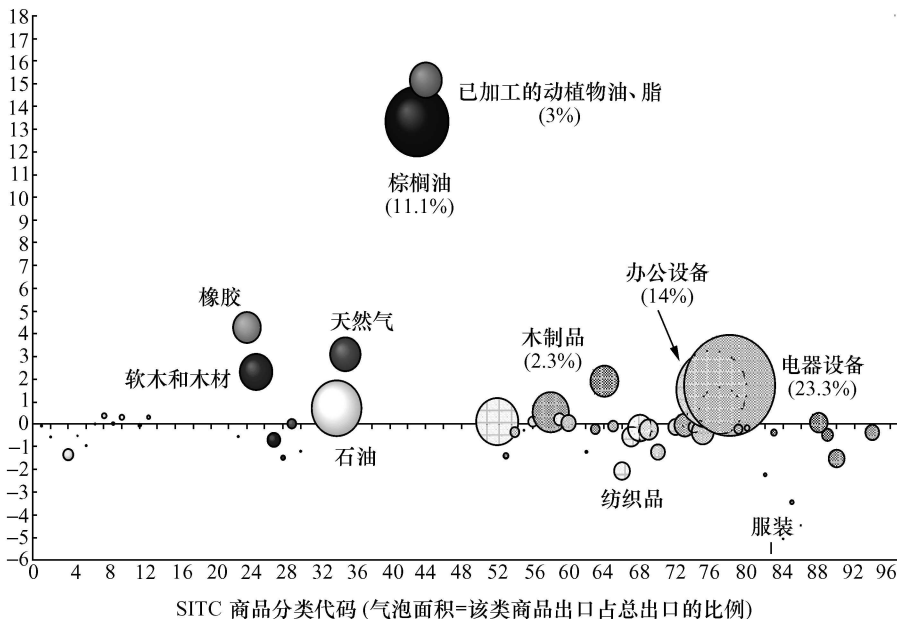


图 11 马来西亚—中国 RCA 构成, 2000—2003

erzkowski, 2001)。第二,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竞争的服装、鞋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将会收缩。尽管因果关系并不能严格鉴定,但是对比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模式,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很明显正在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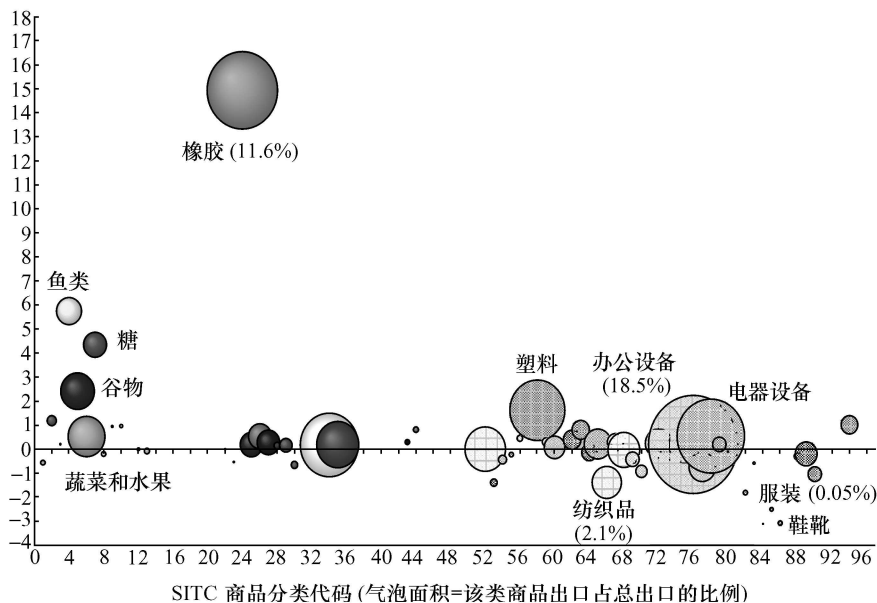


图 12 泰国—中国 RCA 构成, 2000—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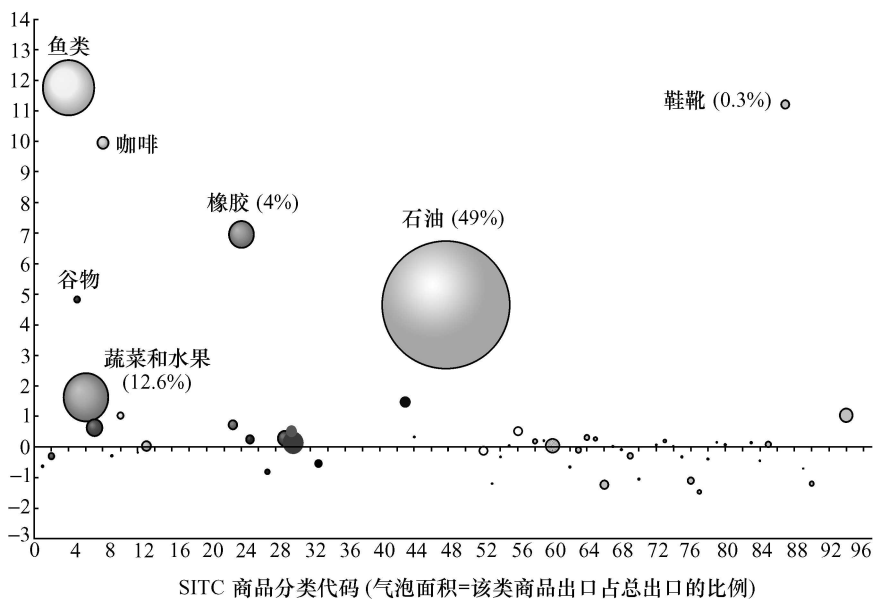


图 13 越南—中国 RCA 构成, 2000—2001

这个方向发展(图 12—14)。第三,自然资源和农业出口——棕榈油、橡胶、木材、原油和煤气以及各种畜牧业和渔业产品——都将扩张。

当前贸易发展趋势似乎在东南亚国家中显现出两种模式。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正在成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商并且这些出口有助于它们的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可预期它们将成为中国市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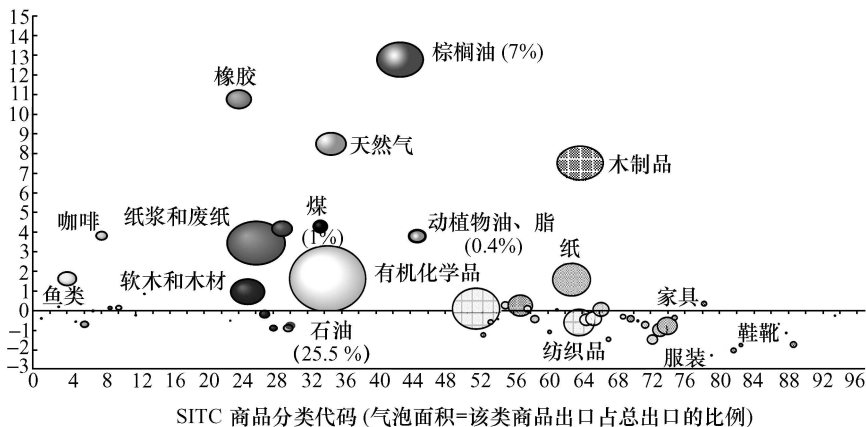


图 14 印度尼西亚—中国 RCA 构成, 2000—2003

主要自然资源产品供应国,并以此进口各种工业制成品。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发展,以上所述贸易模式将成为东南亚贸易的主导方式。

促成东南亚生产和贸易结构改变的潜在驱动力是相当大的,这些驱动力同时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产生作用。中国扩张对很多制造业出口的直接效应可以通过贸易竞争的状况来衡量。间接效应表现在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上对出口和生产模式变化的调整,以及国内经济的产业组成和 FDI 分布的转变。东南亚制造业劳动力很大部分就业于服装、纺织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行业。在印度尼西亚,纺织和服饰生产占非原油出口总价值的 20%,同时在就业人数上占大中型制造业总就业的 25% (James *et al.* 2003);在越南,服装业占总出口价值的 14%,并且该行业雇用全部 4600000 制造业劳动力的超过 24% 的部分;在柬埔寨,服装业出口占总出口比例以及就业占制造业总就业的比例甚至都超过了 80% (UNIDO 2004)⁹。中国竞争导致的这些出口收入的丧失以及由此引起的低工资(或低工资增长)将降低自然资源部门劳动力成本,必定带来了比仅仅由于外部需求增长更高的利润¹⁰。FDI 带来了另一个间接影响,尽管目前这种影响后果并不明确,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东南亚国家中与中国竞争激烈的行业 FDI 流入减少了,也许在中等技术或是高科技行业 FDI 流入的增加弥补了这一效应 (Ng and Yeats, 2003; Krumm and Kharas,

⁹ 利用 GTAP 全球贸易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中国加入 WTO 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 2001—2010 年间的累计影响是负的,尽管对于不同国家不同部门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两个赢家是自然资源部门和高科技部门,确定的输家有服装、纺织和诸如汽车之类的中等资本密集型部门,估计服装出口下降 20%—25%,不同比例取决于不同国家 (Ianchovichina and Walmsley, 2003)。出口严重依赖于服装并且很少有与中国相互补充的制造业的越南被认为将承受最大的受损,大概是其 GDP 的 0.4%。对中国加入 WTO 影响的全面经济分析预测印尼经济总体增长会小幅减缓,但是林业、矿业和农业以及使用这些产品作为投入品的行业会更快地发展。该分析同样预期了纺织、服装和皮革业的大幅度 (23.4%) 下滑。

¹⁰ 劳动力从城市制造业向农业转移的可移动性显然是一个经验估计问题:在印尼,1998 年 8 月一份官方的劳动力市场调查发现,在前一年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失去工作的工人有 39% 转移到了农业 (Manning, 2000: 126),增加了 4700000 个农业就业或者 13.3% 的年增长率 (Hugo, 2000)。

2003)。

一些东南亚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与中国经济不断增加的互补性同样可以从 RCA 指标的相关系数显示出来(表 4)。负值意味着这些国家专业化生产的出口产业与中国专业化生产的行业并不重合;反之正数表示有相当的重合。表格中数字变化趋势说明马来西亚与中国互补,泰国与中国重合生产的部分正在减少;越南存在高度重合,印度尼西亚有从弱互补到强重合变化的趋势。

表 4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 RCA 相关系数

国家	1989—1994	1995—1999	2000—2003
印尼	-0.036	-0.015	0.010
马来西亚	-0.141	-0.127	-0.144
菲律宾	0.147	0.049	0.173
泰国	0.311	0.125	0.078
越南	n. a.	0.379	0.40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贸易数据库数据的计算。

综上所述,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很可能引起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改善其初级产业贸易条件。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受影响最明显的两个国家。中国增长引发的东南亚国家国内产业调整将会增加他们密集使用自然资源和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产出增加。在短期至中期,这一转变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长期增长和福利效应取决于更多未知因素,可能的变数包括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其他市场的增长、投资和政策变化趋势¹¹以及各个东南亚国家国内政策和制度环境。

七、分权活动和自然资源开采

中国的发展激起了对各种自然资源产品全球需求的扩张。鉴于比较优势、地理相近和密切的贸易关系等因素,东南亚民族是这个需求膨胀的主要受益者。种植作物——棕榈、橡胶、咖啡等的面积在截止到 2002 年的十年中几乎呈指数级增长(Coxhead 2003)。沿海渔业和内陆河养殖渔业,以及采矿业等部门也同样快速地发展。

中国森林产品(原木、木材、纸浆和纸张、夹板、胶合板和木制品)进口从 1997 年至今已经增加了一倍多(Sun *et al.*, 2004)。自从中国在 2001 年禁止国内伐木后,木材进口增加了很多。新增加的贸易中很多是从俄罗斯进

¹¹ 在很多美国制造商群体中,对中国贸易膨胀的不断关注正促使一些额外限制政策的出台。见《纽约时报》:“Textile Quotas To End Soon,” 2 November, 2004。

口的, 不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继续供应相当大的部分。比如印度尼西亚向中国出口的合法森林产品从 1997 年已经增加了近 60%。当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木材加工生产能力后, 这些国家至今最大的出口增长来自原木和木材, 夹板这一曾经是最主要的出口品的出口下降了 (Sun *et al.*, 2004)。

在发展中国家, 传统上对于森林和渔场等资源的管理权一直被牢牢地掌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然而, 最近的政策倾向决定性地转向有利于资源管理权向下移交, 尤其是与此过程同时发生的在次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化进程更强化了这一结果。

然而分散管理存在明显的问题,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地方资源管理更注重提高收入和创造就业而不是保护环境, 尤其是保护环境的收益 (而不是成本) 往往可能被该地区之外和计划编制外的下游组织分享, 这些下游团体可以是在该地区之外或是未来的群体。另外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不完全的地方政府民主化对管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制约: 当管理无法对委托人地方政府形成约束时, 权力下放只会导致加速的采伐。此外, 地方政府资源管理会产生作用范围超过其地理边界的外部性 (之前所述对该国下游地区的影响和全球范围内的生物物种和二氧化碳释放问题), 如何建立最优政策“控制区”仍然是很严峻的问题 (Rola and Coxhead, 2005)。上述问题叠加起来影响了地方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性。

最后, 分权过程中构思并不精巧的管理法则损害了各级政府政策或管制行动的能力。在大多数国家, 地方分权包括了政府职员从首都向地方的转移, 这些中央政府机构地方办事处的权力往往从属于地方法令法规。此外, 即使是最优秀最诚实的地方管理也会受到能力限制的困扰; 仅仅因为规模过小就使得大多数地方政府无法支付资源管理、立法设计、法规执行和其他重要领域中专业人员的费用。如果上述情况下地方政府管理受到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贪污腐败或者能力限制的负面影响, 资源管理权力向下移交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丧失对资源管理的控制。

印度尼西亚很不幸地印证了地区分权如何以一系列方式损害有效的资源管理¹²。在其新法令 (New Order) 体系下, 森林管理政策和执行过程绝大部分都被条文化在 1967 年基本森林法 (BFL) 里。这一举措为国家扶持的商业森林采伐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框架, 中央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特别地, 当商业或工业开采权与社区的森林使用权发生冲突时, 传统法律不再有效, 取而代之者无条件地被占优 (Barr, 2002)。1999 和 2000 年通过的新法条款修改了基本森林法 (BFL), 把实质性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地方政府。这个开端标志着国家分散森林管理的最初尝试, 然而这些修改行动没有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分工, 并且它们只是过渡期颁布的法律, 在这个过

¹² Colfer and Resosudarmo (2002)最近的文章提供了对印尼分权运动与森林管理的精彩分析。

渡期里地方上和农村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新法规管制,开始发起了事实上的地方发展政策制定权力分散化运动。Colfer and Resosudarmo (2002) 注意到,缺乏一个强有力(尽管同时也可能是独断的)中央政府或者一套清晰的森林分散管理规则:“……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和场所。法律上确定性的欠缺加上没有合法的体系结构能够把自然资源及其使用者一一对应链接使得几乎人人都可以去采伐森林,没有任何部门承担森林管理的责任。”

事实上唯一确定的是印尼木材的砍伐速度达到每年大约 80000000 立方米,甚至超过雅加达制定的“可维持标准”三倍多(Barr, 2002)。

印尼的捕鱼业迄今一直是该地区单独经营渔业中规模和面积最大的,1999年那个欠考虑的地区分权法导致渔业经历了类似森林采伐那样的过程。在该法律下,沿海渔场的控制被下放到省市级政府,在此过程中没有出台任何边界划分、管理协调规定或是其他基本的管制举措。类似于在森林资源管理下放中发生过的情况,渔业的税收收入增加基本上都进入地方政府财政,这样一来对应拥有开采权的地方政府来说保存资源是激励不相容的(Fox *et al.*, 2005)。几乎所有的沿海渔场都掌控在小经营者手中:大约 402000 艘商业捕鱼船只中只有 57% 是装有机动力装置的(Dutton, 2005)。因此控制这个行业的成本很高,而且控制权已经下放到没有任何动机去实施管制的地方机构了。如前所述,其后果是导致了每年捕捞量成倍增加,但是同等努力程度的每次捕捞收获却不断下降(表明鱼资源存量减少)。

越南近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2003年该国按价值来分主要出口品是纺织和服装(18%),但是其他主要出口构成都是资源产品:海产品(11%)和大米、咖啡、木制品以及橡胶(11%)。中国是其主要贸易伙伴(表1),对中国出口中资源产品占总出口价值的 90%,同比对世界整体出口这一数字大概是 55% (图9)。缺乏对触犯土地、森林和水资源使用法律的违规者足够的法律制裁,越南的权力下放刺激了类似印尼的资源采伐大赛。相对于其巨大的邻居兼贸易伙伴国中国,越南和印尼面临了一样的问题:国内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增加将会使得土地、森林砍伐需求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地方政府也无法控制资源损耗和污染问题。

东南亚国家权力下放过程中的另外一些制度缺陷促成了一些特殊条件,使得地方政府在该条件情形下倾向于容忍资源高速度开采。大体来说,这一条件就是地方政府很难通过税收和管理收费等方式增加地方财税收入。印尼为了达到向地方政府转移收入的均等化(著名的 DAU),采用了一个公式来计算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然而这个公式只囊括了很小一部分来自自然资源开采的收入。也就是说,对于自然资源丰裕的行政区选择增加开采速度获得的收入不会被其他地方政府瓜分,这样一来给那些从当地自然资源开采中分享到大量收入的政府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Lewis, 2001:

333)。在 1999 年法律框架第 25 条条文下（财政收入权力下放），印尼地方政府可以收取石油收入的 15%，煤气收入的 30% 和其他自然资源收入的 80%（Hill, 2002: 26），然而地方政府真实留存的比例可能远高于此（Fox *et al.*, 2005）。

八、资源开采地方化、全球化和资源诅咒

中国经济膨胀和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引发的东南亚经济结构潜在的转变相当巨大。不过，正如前面说过的，只有当这些变化与会阻碍最优政策制定的扭曲相互作用时才会降低整体经济福利。在最贫困的国家，上述扭曲表现为自然资源开采的不完全控制。这种扭曲作为一个历史现实存在，但同时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近期资源管理分散化的脚步似乎大大降低了未来把资源开采控制在一个社会最优化水平上的可能。由于资源管理权的不清晰和不完整或是被滥用于寻租腐败，这个地区的经济体开始更加接近于 Brander and Taylor (1997) 描述的情况：一个在无管制的自然资源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体通过贸易损害了其自身的福利。缺乏对资源开采的有效控制并且无法保证对未来资源租金的控制，这个经济体中任何个体都会尽快在短期内把其自然资源出空套现，因而不难想象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甚至根本不会增长。如果这一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资源要素进口需求，而是东南亚国家体制和政策的失败。

九、结 论

资源丰裕的东南亚经济体历史性的快速发展违背了 Sachs-Warner 的资源诅咒假说，然而持续的全球化过程是否会使该地区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更易于遭受新变量的冲击？特别地，中国的发展是否会把逃脱 80 年代危机的经济体卷入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引发的贸易和投资效应被认为对东南亚地区有较为轻微的负面影响，部分地中和了普遍预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工业部门分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诸如越南和印尼受到的负面影响将远超过马来西亚等国，尤其考虑到后者在高科技部门的优势力量。对前者至关重要的服装、鞋业以及相关产业尤其易受冲击，这些产业的萧条会引至劳动力市场调整从而产生对经济的全面影响。自然资源外部需求的增长加上停滞增长甚至下降的真实工资将刺激一系列行业产出增加，其中包括诸如林业、渔业和矿业等开采部门，橡胶、棕榈和其他工业作物，专门的园艺作物（热带水果、咖啡）和渔业。这些部门产出增加是由中国效应引发的东南亚国家

比较优势转变的体现¹³。

如果东南亚国家内部存在法律和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地衡量和管制一系列资源开采和出口的机会成本,那么它们在地区经济中重新定位角色的长期福利效应是不显著的。然而,一旦对木材、渔业和耕地的需求增加没有法律保护或是受到考虑并纠正外部性的经济政策的限制,更高的全球资源需求和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会激起包括把森林变为耕地的资源采伐活动的加速。在该地区的某些地方,这些难以逆转的变化降低了长期创收能力并使得这些地方更容易发生环境灾难。本文认为在不完善权力分散化的国家发生上述结构的可能性更高,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资源使用权向下移交的过程中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

有些忠告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终将使得其劳动力工资上升,这个趋势将会降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近十年来保持对美元固定汇率的人民币的升值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中国国内大量使用进口原材料或是中间品的行业和主要面对国内市场的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将会受益——两者都将削弱诸如服装和家具之类的劳动力密集型高附加值行业的竞争力。在东南亚,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生产商将毫无疑问地生存并兴旺起来,即使他们处在总体萎缩的行业也不例外。最后,诸如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与中国经济有很大互补或是重合部分不断减少的经济体将会在与快速增长的中国更为自由的贸易过程中获益,诸如计算机元件和其他高端电子产品这些专门产品部门的增长应该弥补一些本文之前所述的中国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些增长前景在一些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尤其是印尼和越南,则不是很强)。上述的每一种可能都值得仔细和深入研究。

至于政策建议方面,本文所提及的资源最丰裕国家可能的变化是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诅咒”仍然有待时间去证实。首先,这些变化是在全球化获益(预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众所周知,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时会引发保存资源的需求并且会创造执行这些需求的规则体系——Kuznets的环境曲线所描述的机制。其次,自然资源诅咒有赖于市场或是制度失效,这些失效包括弱制度和管制的效应。在制度较强的国家,产权(包括污染消费权)通常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约束了彻头彻尾的资源开采大赛策略。就这点来看,越南和其他国家境内的高地以及印尼外围的岛屿是亚洲地区受中央政府控制最薄弱的地区,似乎也就成为了最容易受到诅咒攻击的地方。其他国家和地区显示了更为复杂的经验证据,其中的一些表现似乎比预期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

¹³ 有意思的是,这一变化趋势将使得东南亚国家“回到过去”。历史记载描述了东南亚15世纪海上贸易兴旺时期的情景:

“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原材料的出口商和制成品的进口商,其自身的制成品曾经是地区贸易的一个主角,但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与其相邻的人口密集的制造大国不再需要这些产品。热带农业作物和园艺作物……从贸易繁荣中获得最大的刺激……紧随其后的是森林产品。”(Reid, 1993: 32)

这些国家地方分权运动与全球市场变化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其自然资源管理将成为决定这些地区的森林、土壤和其他自然资源存量及其全体公民的福利的关键因素。

附录

表 A-1 自然资源丰裕经济* 1971 年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百分比)和 1975—2001 年人均 GDP 增长率

	国家	自然资源出口 占总出口比例%	人均 GDP 增长率%	国家	自然资源出口 占总出口比例%	人均 GDP 增长率%
高自然资源/高增长	泰国	89	3.73	马来西亚	91	3.45
	印度尼西亚	98	3.37	智利	95	3.31
	斯里兰卡	98	3.09	苏丹	100	2.31
	巴拿马	98	2.31	布基纳法索	94	2.22
	所罗门群岛	103	2.22	新西兰	90	2.15
	贝宁湾	94	2.12			
高自然资源/低增长	阿尔及利亚	91	1.9	玻利维亚	97	1.63
	喀麦隆	90	1.77	乍得湖	94	1.49
	科特迪瓦	94	1.13	厄瓜多尔	98	1.91
	加蓬	92	1.11	加纳	99	1.74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98	1.55	圭亚那	97	1.94
	洪都拉斯	97	1.93	伊朗	95	1.48
	科威特	95	0.69	马达加斯加	91	1.1
	马拉维	97	1.86	马里	91	1.93
	毛里塔尼亚	92	1.84	尼日尔	96	1.1
	尼日利亚	99	1.45	秘鲁	99	1.48
	菲律宾	93	1.88	委内瑞拉	99	1.32
	赞比亚	100	0.83	澳大利亚	80	2.55
	巴巴多斯岛	75	2.38	巴西	82	2.21
	哥伦比亚	87	2.27	刚果	66	2.32
低自然资源/高增长	哥斯达黎加	77	2.27	塞浦路斯	83	4.03
	埃及	72	3.09	希腊	69	2.37
	约旦	77	2.48	墨西哥	62	2.25
	摩洛哥	85	2.39	新加坡	63	3.7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6	2.54	突尼斯	84	2.75
	土耳其	88	2.34	乌拉圭	80	2.2
	阿根廷	85	1.79	中非共和国	62	1.19
	萨尔瓦多	68	1.68	危地马拉	72	1.87
	尼加拉瓜	85	0.6			
	低自然资源/低增长	塞内加尔	77	1.72	多哥	82

* 把 1971 年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例超过 60% 的国家定义为自然资源丰裕国家;表格中“高”和“低”都是相对平均水平而言。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0481, 2004.
- [2]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An African Success Story: Botswana", CEPR Discussion Papers No. 3219, 2002.
- [3] Athukorala, P., "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Division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in Trade and Development No. 2003/21, 2003.
- [4] Auty, R. 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source-Driven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4-6), 839-846.
- [5] Balassa, 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65, 33, 99-123.
- [6] Barr, C., "Timber Concession Reform: Questioning the 'Sustainable Harvest' Paradigm", in Colfer, C. J. Pierce and I. A. P. Resosudarmo (eds), *Which Way Forward? People, Forests and Policymaking in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Bogor, Indonesia: CIFOR; and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191-220, 2002.
- [7] Brander, J. A. and M. S.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Open-access Renewable Resources: The Small Open Economy Cas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30(3), 526-552.
- [8] Brock, W. A., and S. N. Durlauf, "Growth Empirics and Re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1, 15(2), 229-272.
- [9] Colfer, C. J. P. and I. A. P. Resosudarmo (eds), *Which Way Forward? People, Forests and Policymaking in Indonesia*,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Bogor, Indonesia: CIFOR; and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 [10] Coxhead, I.,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sia: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03, 17(1), 22-54.
- [11] Durlauf, S. and P. A. Johnson, "Multiple Regimes and Cross-country Growth Behaviour",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995, 10(4), 365-384.
- [12] Dutton, I. F., "If Only Fish Could Vote: The Enduring Challenges of Coastal and Marine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Post-reformasi Indonesia", in B. Resosudarmo (ed),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donesia's Natural Resources*. Singapore: ISEAS, 2005.
- [13] Fox, J. J.; D. S. Adhuri and I. A. P. Resosudarmo, "Unfinished Edifice or Pandora's Box? Decentralisa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Indonesia", in B. Resosudarmo (ed),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donesia's Natural Resources*. Singapore: ISEAS, 2005.
- [14] Gylfason, T.,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 847-859.
- [15] Hausmann, R. and R. Rigobon,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ource Curse':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s No. 9424, 2002.
- [16] Hill, H., "Spatial Disparities in Developing East Asia: A Survey",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16(1), 10-35.
- [17] Hugo, G.,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Internal Population Movement in Indonesia",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0, 36(2), 115-138.

- [18] Ianchovichina, E. and T. Walmsley, “The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109, 2003.
- [19] Ianchovichina, E., S. Suthwart-Narueput and M. Zhao, “Regional Impact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in K. Krumm and H. Kharas (eds), *East Asia Integrates: A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Shared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0] Ianchovichina, E. and W. Martin, “Economic Impact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 D. Bhattasali, S. Li and W. Martin (eds), *China and the WTO: Accession, Policy Reform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Bank, 2004.
- [21] James, W. E., D. J. Ray and P. J. Minor, “Indonesia’s Textiles and Apparel: the Challenges Ahead”,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3, 39(1), 93—103.
- [22] Kwan, Chi Hu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Flying-gees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S Import Statistics”, Nomura Institute, NRI Papers No. 52, 2002.
- [23] Krumm K. and H. Kharas, *East Asia Integrates: A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Shared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 [24] Lall, S., and M. Albaladejo, “China’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 Threat to East Asian Manufactured Exports”,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9), 1441—1446.
- [25] Lewis, B., “The New Indonesian Equalization Transfer”,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1, 37(3), 325—343.
- [26] Li, Muqun and I. Coxhea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4.
- [27] Manning, C.,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Indonesia’s Economic Crisis: Context,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0, 36(1), 105—136.
- [28] Manzano, O. and R. Rigobon, “Resource Curse or Debt Overhang?” NBER Working Papers No. 8390, 2001.
- [29] Ng, F. and A. Yeats,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 What ar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84, 2003.
- [30] Reid, A.,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1] Rodriguez, F. and D. Rodrik,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7081, 1999.
- [32] Rola, A. C., and I. Coxhea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Uplands of Southeast Asia: Challenges for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D. Colman and N. Vink (eds), *Reshaping Agri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Malden, MA and Oxford, UK: Blackwell, 2005.
- [33] Sachs, J. and A.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98, 1995.
- [34] Sachs, J. and A. Warn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45(4—6), 827—838.
- [35] Strutt, A. and K. Anderson, “Will Trade Liberalization Harm the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Indonesia to 2020”,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0, 17, 203—232.
- [36] Sun, X., E. Katsigris and A. White, “Meeting China’s Demand for Forest Products”, Forest Trends, Chinese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CIFOR, 2004 (available at www.forest-trends.org).
- [37] Treffer, 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Trade and Other Myste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5), 1029—1046.

- [38] UNIDO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tatistical databases, accessed 5 November 2004 at <http://www.unido.org/regions.cfm?TY=R&RID=02>.
- [39] Vincent, J. R., J. Aden, G. Dore, M. Adriani, V. Rambe and T. Walton, "Public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s in Indonesia",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02, 38(1): 61—74.
- [40] Weiss, J. and Gao, 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ort Threat to ASEAN: Competition in the US and Japanese Market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No. 2, 2002.
- [41] World Bank, "Indonesia: Maintaining Stability, Deepening Reforms", Jakarta: World Bank, Brief No. 25330-IND, 2003.
- [4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http://www.worldbank.org/data/-onlinedatabases/onlinedatabases.html>. Accessed January 2005.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in Southeast Asia: Does China's Growth Threaten Regional Development?

IAN COXHEA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Abstract Due to China's rapid growth and integration with global markets, Southeast Asia's resource abundant economies are los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and gaining it in natural resources. The former poses a threat to future industrial expansion. The latter will generate short-run export windfalls but may not be sustainable.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long-run growth and welfare, particularly in the poorest economies, and especially in light of decentralization, which has reduced resource management capacity? Rapid resource depletion and reduced industrial growth could expose countries to a period of slow economic growth, as predicted in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JEL Classification F18, O13, Q00